

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 政局走势的研判^{*}

张宏明

内容提要 北非动荡不仅对中东阿拉伯世界造成直接的冲击，而且对撒哈拉以南非洲政局也构成潜在的影响。在此背景下，由于确实存在诸多有可能引发动荡的社会政治经济因素，撒哈拉以南非洲局部，即某些国家的政局动荡或许难免，但总体稳定的态势不会改变；即便一些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发生动乱，在性质上亦有别于北非国家，更不会像北非地区那样产生扩散效应，覆盖整个次区域，原因在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在民族结构、宗教信仰、文化传统，特别是政治改革和政治治理等方面均与包括北非在内的中东阿拉伯国家存在较大差异。“总体稳定、局部动荡”仍不失为非洲政局之常态。

关键词 北非 撒哈拉以南非洲 政局 政治民主化

作者简介 张宏明，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07）。

2010 年被非洲联盟确定为“非洲和平安全年”，非盟希望藉此推动非洲一些国家内部冲突和危机的和平解决，为经济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但结果远远低于预期。非但原有的危机、冲突未得到缓解，就在 2010 年行将结束之际，突尼斯的一个偶发事件引发了全国性骚乱；更加出人意料的是，在中东阿拉伯世界产生连锁反应；其中北非国家可谓首当其冲，且无一幸免，只是程度不一而已。此次北非社会骚乱在政治层面的直接结果是：突尼斯总统本·阿里亡命他乡；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被迫辞职；利比亚革命领导人卡扎菲命运未卜；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的社会骚乱虽得到暂时控制，但是否会复发尚难料定；苏丹局势同样令人堪忧，南苏丹公投刚刚尘埃落定，位于北南争议地区的阿卜耶伊便发生武装冲突并造成百余人伤亡。

对于非洲政局的走势，往前推 10 年，国人或许尚可以一种“旁观者”姿态从容地加以研判；但现在这个问题变得非常迫切，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中国在非洲的权益。中国开展对非洲合作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大致涵盖国际体系、地区和国家 3 个层面。就地区层面而言，时下国人关注的问题是：北非势态是否会穿越“大沙漠”，传导到撒哈拉以南非洲；换言之，撒哈拉以南非洲是否会复制北非的乱局，进而对中国在非洲的权益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事实上，关于这一问题的第一问，不仅中国学者

^{*} 本文系笔者参加“非洲发展趋势与中非关系前景高端研讨会”（2011 年 4 月 2 日在浙江师范大学召开，由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联合主办）时提交的论文。笔者在发表前做了一些内容增补及学术规范方面的工作，但保留了原有观点。

关注,西方和非洲学者也有一些预判。^①

撒哈拉以南非洲发生局部动荡的可能性

目前,北非动荡已经持续数月,不仅对中东阿拉伯世界造成直接的冲击,而且也的确对撒哈拉以南非洲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局部发生动荡可能性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

首先,引发北非国家动乱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许多国家都存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比如说: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贫富两级分化严重;公职人员以权谋私,贪污腐败;人口结构年轻化,青壮年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处于转型过渡期,各种问题堆积,处于矛盾易发期;国际金融危机“迟到”的影响^②;全球化与“新媒体”的作用,等等。特别是在社会经济方面,北非所面临的问题,撒哈拉以南非洲不仅同样存在,某些方面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许多国家的失业率和通胀率基本与北非相当,而贫困人口比率则大大高于北非。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金融危机叠加的背景下,普通民众对生活前景的失望情绪很容易转化为政治愤怒。

其二,近年来,撒哈拉以南非洲政局虽然总体稳定,但局部形势并不平静,个别国家的局势甚至十分脆弱,比较容易发生突发性事件。诸如,矛盾重重的津巴布韦^③联合政府,僵局难解;久拖未决的马达加斯加政治危机^④,暴力事件频发;旷日持久的索马里内战^⑤(持续近20年)依然战事迭起,毫无松动迹象;反复推迟的几内亚总统选举^⑥,在选后暴力事件仍时有发生;科特迪瓦选举危机^⑦愈演愈烈,非但未能结束长达8年的政治危机,还陷入了“一国二主”的乱象并引发内战。此外,南苏丹公投后如何从“母体”顺利分离也面临诸多棘手的问题,诸如边界划分、国籍归属、安全问题,以及石油收入分配等。

其三,2011年被称为“非洲的选举年”^⑧,一般而言,在选前、选中、选后,突发的失控性事件均有可能发生。今年1月9日至15日“南苏丹”全民公决^⑨,开启了非洲选举年的帷幕,一年之内

① Jean - Paul Lecoq “Initier un rapport rapport d’ égal à égal avec l’ Afrique” Numéro 182, <http://pambazuka.org/fr/category/comment/71861>, Mars. 20, 2011; William Gumede “Africa rising? Will popular rebellions spread south of the Sahara?”, <http://pambazuka.org/en/category/comment/71780>.

② 一些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领导人曾一度夸耀他们的国家没有遭受到金融危机的重创,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原因在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多为外向型经济,其社会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外援。国际金融危机“迟到”的影响,一方面导致外援中止或减少;另一方面,输入性通货膨胀引发物价上涨。

③ See Jocelyn Alexander et Blessing - Miles Tendi “La violence et les urnes: le Zimbabwe en 2008”, *Politique Africaine*, N°111, Octobre 2008, pp. 111 - 129.

④ 马达加斯加政治危机始于2008年12月。塔那那利佛前市长拉乔利纳以拉瓦卢马纳纳总统擅自关闭私营电台和电视台为由,率领群众举行反政府集会,引发部分军人倒戈。拉瓦卢马纳纳于2009年3月17日宣布辞职,之后流亡国外。3月21日,拉乔利纳在军人支持下就任马达加斯加过渡总统。马达加斯加当前的政局和9年前有诸多相似之处。关于这两段历史, see Didier Galibert “Mobilisation populaire et répression à Madagascar, les transgressions de la cité culturelle”, *Politique Africaine*, N°113, Mars 2009, pp. 139 - 151; Françoise Raison - Jourde “Le pouvoir en double”, *Politique Africaine*, N°86, Juin 2002, pp. 46 - 67.

⑤ Ken Menkhaus, Arrangements sécuritaires locaux dans les régions somaliennes de la Corne de l’ Afrique, *Politique Africaine*, N°111, Octobre 2008, pp. 22 - 43.

⑥ 2010年11月7日,几内亚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15日,国家独立选举委员会宣布阿尔法·孔戴赢得选举。结果公布后,不同候选人的支持者之间爆发冲突,致死多人。塞卢·达莱因·迪亚洛本人也质疑选举结果,并提请最高法院裁决。See *Jeune Afrique*, du 21 au 27 novembre 2010, pp. 12 - 15.

⑦ 2010年10月31日,科特迪瓦举行总统选举。独立选举委员会宣布瓦塔拉在二轮选举中胜出;但是宪法委员会以选举存在舞弊为由,推翻独立选举委员会公布的结果并宣布巴博赢得选举。12月4日,巴博和瓦塔拉几乎同时宣誓就任总统,由此产生“一国二主”的政治僵局。本次总统大选原本旨在结束自2002年以来科特迪瓦因内战所造成的分裂状态;结果却加剧了政局动荡,大选后,效忠巴博的军队和瓦塔纳支持者不断发生武装冲突。

⑧ Francois Soudan “2011 l’ Afrique aux urnes”, *Jeune Afrique*, du 26 décembre 2010 au 8 Janvier 2011, pp. 32 - 37.

⑨ Anne Walraet “Le Sud - Soudan dans l’ attente du referendum, Un regard sur la formation de l’ état par le bas”, *Politique Africaine*, N°119, Octobre 2010, pp. 189 - 206.

19 个非洲国家^①（其中撒哈拉以南非洲有 17 国）要举行总统或议会换届选举，遍及非洲东、南、西、北、中五大区域；而非洲国家有逢选必乱的先例，加之北非势态的示范效应，可以说，今年系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多事之秋”。原因还在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政治民主化并非是一种“自然过程”，而是在冷战终结这一特殊的背景下，在内部条件并不充分、外部施以高压的情况下起步和实施的，这种先天不足也注定了其政治发展进程复杂性和脆弱性。

其四，北非势态已经引起了一些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反政府人士的共鸣，或密谋策划“倒政府”行动，或通过互联网鼓动民众进行“街头革命”^②。例如：今年 1 月 17 日，毛里塔尼亚一名男子效仿突尼斯小贩在总统府前自焚，抗议政府对其部族的不公；2 月 23 日，在喀麦隆主要城市爆发了要求总统保罗·比亚下台的示威活动；同日，在津巴布韦，40 多名学生、工会活动者和反政府人士召开“津巴布韦和非洲能从埃及和突尼斯革命中学到什么”为主题的研讨会，并密谋策划推翻穆加贝总统的活动；3 月 5 日，安哥拉一反政府组织在“脸谱”（Facebook）上呼吁民众在独立广场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以推翻现政权；斯威士兰和赞比亚也有人鼓动民众效仿埃及，通过“街头革命”推翻现政权。此外，西方媒体也推波助澜，将上述现象视为北非动荡正向撒哈拉以南非洲蔓延的前兆，甚至预测南非、莫桑比克^③等国已处于抗议浪潮的边缘。

其五，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在政治发展方面自身亦存在问题。由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是在外部施压促变和在内部条件并不充分的情况下启动的，因此，其民主化进程还面临诸多问题^④，其对政局稳定的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诸如：（1）政党过多，且党派之间矛盾重重，始终处于分化组合的动态变化之中；加之政党兴替导致政权更迭频率加快（至少在理论上），这无疑不利于维系政府政策的连续性并容易导致政府政策的短期行为。（2）在许多国家，政府施政时常受到政党政治的干扰，特别是在反对派控制议会多数的情况下，政党政治往往牵扯政府大量精力，而且会对政府的正常运作形成掣肘，加大政府施政难度，影响行政效率，其直接后果是使许多与国家发展或民生攸关的政策措施难以顺利贯彻落实。（3）民主政治在许多国家尚局限或滞留在制度性安排上，而尚未充分实现“民主是发展的条件”这一预期目标，成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内驱力。（4）目前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民主政治主要还是一种“城市现象”，民主政治在许多国家成了政治精英的特权，特别是成了政客们基于民主政治的竞争规则进行权力角逐的一种“政治游戏”。（5）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出现“逆向而动”之势，具体反映在：在一些国家，多党制下的民主选举成了当选者实行“新权威主义”甚或“打倒皇帝做皇帝”，而又能免受国内外舆论谴责的盾牌；在另外一些国家，当权者已经或试图通过主导修宪，谋求“第三任期”；其结果是，一些国家的领导人长期执政，大权独揽，甚或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终身任职”的老人政治局面；个别国家的政权继承显现出家族统治的倾向；还有一些国家的政治治理采取了强人政治或军人政治等威权统治方式。在下表所列 15 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个人或家族执政时间平均超过 30 年，其中最长的为 90 年（斯威士兰），最短的也有 17 年（冈比亚）；子承父业的有 4 个国家（多哥、加蓬^⑤、斯威士兰、吉布提）；军人出身或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领导人有 7 位；领导人在 60 岁以上的有 9 位，年龄最大的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已有 87 岁；年龄较小的冈比亚总统叶海亚·贾梅（46 岁）则是地地道

① 这些国家是：刚果（布）、津巴布韦、中非共和国、马达加斯加、尼日利亚、贝宁、尼日尔、赞比亚、利比里亚、塞舌尔、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佛得角、喀麦隆、乌干达、乍得、埃及、吉布提、冈比亚和苏丹。

② *The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23, 2011;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3, 2011.

③ Luís de Brita “le difficile chemin de la democratization”, *Politique Africaine*, N°117, Mars 2010, pp. 5 - 20.

④ 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政治发展自身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笔者将另有专文，这里只列举一些现象，不做展开分析。

⑤ 关于加蓬奥马尔·邦戈家族统治情况，See Florence Bernault et Joseph Tonda “Fin de règne au Gabon, Le Gabon: une dystopie tropicale”, *Politique Africaine*, N°115, Octobre 2009, pp. 5 - 26; Joseph Tonda, Omar Bongo Ondimba “Paradigme du pouvoir postcolonial”, *Politique Africaine*, N°114, Juin 2009, pp. 126 - 137.

道的政治强人。凡此种种都表明，目前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民主政治尚不成熟，欧美学者亦不讳言西方民主在非洲发生变异的事实。

基于上述原因和分析，鉴于今年是非洲的选举年，加之北非势态的示范效应，笔者认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局部，即某些国家的政局动荡或许难免。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部分领导人的当政情况简表

国 家	首 脑	年 龄 (岁)	执政时间及上台方式	执政时间
多哥	福雷·纳新贝	45	子承父业。2005 年就任总统。其父纳辛贝·埃亚德马时 1967 ~ 2005 年执政。	本人 6 年， 家族 44 年
加蓬	阿里·邦戈·翁丁巴	52	子承父业。2009 年 10 月就任总统。其父奥马尔·邦戈 1967 ~ 2009 年执政。	本人近 2 年， 家族 44 年
斯威士兰	姆斯瓦蒂三世	43	子承父业。1982 年继承王位，1986 年亲政；其父索布扎二世 1921 ~ 1982 年在位。	本人 25 年， 家族 90 年
吉布提	伊斯梅尔·奥马尔·盖莱	64	1999 年至今，2010 年议会通过宪修正案，取消总统连任次数限制。其叔父哈桑·古莱德·阿普蒂敦 1977 ~ 1999 年执政。	本人 12 年， 家族 34 年
赤道几内亚	特奥多罗·奥比昂·恩圭马·姆巴索戈	69	军事强人，从 1979 年 8 月政变上台，连任 4 届总统。	32 年
安哥拉	若泽·爱德华多·多斯桑托斯	69	1979 年执政，连选连任至今。	32 年
津巴布韦	罗伯特·穆加贝	87	1980 年执政，连选连任至今。	31 年
喀麦隆	保罗·比亚	78	1982 年执政，连选连任至今。	29 年
刚果（布）	萨苏·恩格索	68	军人出身，1979 ~ 1992 执政，1997 年重新执政至今。	累计 27 年
乌干达	韦里·穆塞韦尼	67	军人出身，1986 年政变上台，执政至今。	25 年
布基纳法索	布莱斯·孔波雷	60	军人出身，1987 年政变上台，执政至今。	24 年
乍得	伊德里斯·代比	58	军人出身，1990 年政变上台，执政至今。	21 年
埃塞俄比亚	梅莱斯·泽纳维	56	1991 年武装夺取政权，连选连任至今。	20 年
厄立特里亚	伊萨亚斯·阿费沃基	65	1993 年执政，连选连任至今。	18 年
冈比亚	叶海亚·贾梅	46	军事强人，1994 年政变上台，连选连任至今。	17 年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资料（截至 2011 年初）整理。

撒哈拉以南非洲不会在整体上复制北非乱局

上文谈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局部，也即某些国家存在发生政局动荡的可能性；但是，可能性并不意味着一定转化为必然性。退一步说，即便一些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发生政局动荡，在性质上亦有别于北非国家，更不会产生跨越疆域的发散效应，进而覆盖整个次区域。从趋势上看，“总体稳定、局部动荡”依然是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撒哈拉以南非洲，乃至整个非洲大陆政局走势之常态。上述观点主要基于以下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下列判断或事实。

（一）与北非国家的国情存在较大差异

人们在谈论一个事件引发一连串的连锁反应时，常常用“多米诺骨牌效应”加以描述。但“多米诺效应”的发生是有条件的，它要求相关的骨牌处于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并且对骨牌的尺寸、

浓厚、质地、重量、间距也有相应的要求。在全球化和“新媒体”时代，国与国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密切。从这个意义上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与包括北非在内的中东阿拉伯国家并不绝缘，无疑会受到北非势态或多或少的影 响。

但由于受撒哈拉大沙漠的地理阻隔，撒哈拉以南非洲在历史上与北非之间的经贸联系和人文交往并不密切，现在上述关系虽有所增强，但也谈不上密切。更为重要的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与北非国家在政治过程、政治体制、政党制度、政治文化、政治治理、政治参与，以及社会结构（包括民族结构）、经济结构、发展水平、宗教信仰、传统文化等方面也存在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性意味着撒哈拉以南非洲并不具备在整体上复制北非乱局的条件。

（二）文化方面不像阿拉伯文化那样具有渗透性

政治乱局之所以在包括北非在内的阿拉伯国家迅速蔓延，除了政治、经济、社会原因外，民族结构、宗教信仰、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同质性”或“同构性”特征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这种特征使得中东任何一国的内部事件均具有跨越疆域（跨国）相互渗透的特征。阿拉伯民族主义、泛伊斯兰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思潮均具有超国家特性，并在中东的近现代史中，都曾掀起过大规模的区域性运动。^①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情况则要复杂得多^②，绝大多数国家的社会结构反映在民族结构上多为复合族体或多族体国家；不仅民族结构（部族）具有异质性或破碎性特征，其宗教信仰也是多元的，除了传统宗教外，还有外来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事实上，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异质性社会结构，与传统宗教信仰形式的多元化有着直接的关联。原因在于，作为撒哈拉以南非洲文化内核的传统宗教基本上是本土性的，甚至在一国内部，其地域或地方性特征亦十分明显，无论是祖先崇拜还是神灵崇拜都是建立在“神人同族”的实有的或假想的亲缘关系基础上的，正所谓神灵不接受异族的祭祀，民众也不祭祀异族的神灵。据此，不仅北非势态不会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产生“蝴蝶效应”；而且撒哈拉以南非洲一国内部的突发事件也不具有像中东阿拉伯国家那样的外溢性或扩散力，进而引起其他国家的连锁反应。

（三）政局动荡的起因或性质有别于北非国家

诚然，近年来撒哈拉以南非洲局部形势并不平静，个别国家甚至仍处于内乱或内战之中；但是，就总体而言，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问题在性质上不同于北非国家，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只要透过表象、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到，就引发政局动荡甚或爆发激烈武装冲突的因素而言，并非是自下而上的“平民造反”或“街头革命”；而多系不同政党、政治派别，或不同种族、民族、部族或地方利益集团之间的政治斗争或权益角逐。而且，发生剧烈动荡的国家均是反对派势力比较强大的国家。上文提及的津巴布韦、马达加斯加、科特迪瓦^③、几内亚^④、索马里、苏丹等国即属于此列。

另则，就事态发展来看，那些发生政治动荡或武装冲突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政局已经显露出缓和的趋向：如几内亚选举危机以塞卢·达莱因·迪亚洛接受最高法院的裁决而得到缓解（2010年

① 参见刘中民《乱局为何在中东迅速蔓延》，载《环球时报》2011年2月25日。

② 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民族结构、宗教信仰、文化传统的特征，详见笔者所著的《多维视野中的非洲政治发展》一书的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44~203页。

③ 关于科特迪瓦近8年来的政治危机以及最新事态进展情况，See Richard Banégas et Ruth Marshall - Fratani, “Côte d’Ivoire, un conflit régional ?” *Politique Africaine*, N°89, Mars 2003, pp. 5 - 11; Comfort Ero et Anne Marshall, “L’ouest de la Côte d’Ivoire: un conflit libérien ?”, *Politique Africaine*, N°89, Mars 2003, pp. 88 - 101; Pascal Airault et Baudelaire Mieu, “Côte d’Ivoire, La lutte finale”, *Jeune Afrique*, du 14 au 20 novembre 2010, pp. 32 - 35; Marwane Ben Yahmes, “Présidentielle 2010, Les deux Côte d’Ivoire”, *Jeune Afrique*, du 21 au 27 Novembre 2010, pp. 22 - 28; Marwane Ben Yahmes, “Côte d’Ivoire, Coup d’Etat contre la démocratie”, *Jeune Afrique*, du 5 au 11 Décembre 2010, pp. 24 - 26.

④ 关于几内亚在兰萨纳·孔戴总统病逝前后的政情，See Michelle Engeler, “Guinea in 2008: the unfinished revolution”, *Politique Africaine*, N°112, Décembre 2008, pp. 87 - 98.

12月3日几内亚最高法院裁定阿尔法·孔戴赢得选举)^①；科特迪瓦两大阵营的政治对垒和武力对决以前总统洛朗·巴博的被捕而告一个段落，尽管民族和解之路仍然充满变数；马达加斯加政治危机的解决也显露曙光，今年3月初，多数政党和政治团体接受了“南共体”提出的化解危机方案；津巴布韦联合政府虽然矛盾重重，但两大派别均希望通过政治途径即民主程序解决纷争；安哥拉有着长达27年内战的痛苦记忆^②，国家重建方兴未艾，民众也不愿重蹈覆辙。

（四）国家经济逐步走出国际金融危机的阴霾

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非洲经济经历了独立以来难得的快速发展期。在过去5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经济增长率不仅在所有年份均高于全球经济增幅，而且在多数年份高于北非。除了2009年由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增幅（2.6%）有所放缓外，其余年份均高于5%。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去年10月发布的“展望报告”，撒哈拉以南非洲2010年的经济增长率将达到5%，2011年增幅有望攀升至5.5%。如果这一预测能变成现实，意味着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将成功走出金融危机阴影，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报告同时指出，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的良好表现得益于危机前各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外汇储备的增加以及债务的逐渐减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洲地区负责人安托瓦妮特·萨耶赫指出，鉴于该地区持续增长的国家财政收入以及长期稳定的私人及公共投资，今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国家国内消费需求有望保持强劲增长，而快速发展的非洲市场也将有助于带动该地区的出口。

（五）民众对“新媒体”具有较强的免疫力

笔者注意到，有些国内外学者在分析此次中东国家政治乱局迅速蔓延的原因时特别强调全球化，特别是“新媒体”因素在其间的作用。事实上，网络、手机只是一种中性工具，它既可传播佳音，亦可散布恶讯。“新媒体”之所以能够在北非国家并发挥如此巨大的效能，原因在于北非国家在政治治理上多采取威权统治方式，社会控制过严，突出反映在抑制政治参与，严控新闻自由。例如埃及针对极端势力的紧急状态法实施达30年之久，实际上变成了遏制所有反对派的杀手锏；突尼斯，特别是利比亚的社会控制更严。此外，北非国家的当权者还一直试图通过切断民众与现代世界的联系来保持国内政局的稳定。但在全球化与“新媒体”时代，这种做法行不通了；人们开始使用手机，收看卫星电视，登录互联网，这无疑加大了统治集团控制信息的难度。^③

相对于北非国家在社会控制方面所采取的高压态势，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社会开放程度则要大得多。借助民主政治的制度性安排，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民众的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特别是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等公民权力基本得到保障。因而，较之北非国家，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则对“新媒体”具有更强的免疫力；其原因不在城市化发展水平及互联网或现代通信工具的普及率比北非国家低，而恰恰在于其社会开放程度，特别是新闻自由度比北非国家高。

（六）相关国家针对北非乱局已经采取了防范措施

为防止北非势态波及本国，部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政府已经采取了软硬兼施的防范措施。例如，安哥拉执政党人民解放运动总书记儒利昂·马特乌斯明确表示，“不要将在北非发生的事情与安哥拉混淆”，“权力不会在街头获得”，还表示将对任何企图走上街头闹事的行为“采取严厉措施”；赞比亚总统鲁皮亚·班达警告对手说，不要误导赞比亚人通过埃及式的抗议推翻政府，赞比亚是“民主的模范”，1991年以后一直在进行民主、透明、和平的选举，今年的选举也将如此，人民可以根据意愿选择领导人，赞比亚的民主正是阿拉伯国家人民所争取的；津巴布韦军方和警方官员则表

① “Interview Cellou Dalein Diallo”, *Jeune Afrique*, du 19 au 26 décembre 2010, pp. 34 – 35.

② 安哥拉在1975年独立后便陷入旷日持久的内战状态，关于这段历史，See Christine Messiant “Fin de la guerre, enfin, en Angola. Vers quelle paix?”, *Politique africaine*, N°86, Juin 2002, pp. 183 – 195; Didier Péclard “Les chemins de la reconversion autoritaire en Angola”, *Politique Africaine*, N°110, Juin 2008, pp. 5 – 20.

③ [美国] 学者伊恩·布雷默 《用J曲线分析中东局势》，载 [英国] 《金融时报》2011年2月18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7003.

示,任何埃及和突尼斯形式的抗议活动在该国都将受到严厉处置,事实上,已有40多人因在参加有关埃及局势的研讨会被捕,并正在接受叛国罪指控。

综上所述,在经历了政治变革的阵痛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在政治层面所面临的内部压力要比北非国家小得多,这意味着即便有些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发生政治动荡或社会骚乱,性质也不同于包括北非在内的中东阿拉伯国家。事实上,北非国家目前经历的“街头革命”或“广场革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民众来说并不陌生,早在10多年前,甚至20年前就已经经历过了^①,并为之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在整体上复制北非乱局的几率是很小的。上文提及的“选举年”因素也只是一推测,未必一定成为现实。201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同样有许多国家举行总统或立法换届选举,但除了几内亚和科特迪瓦外,其余国家,如多哥、布隆迪、卢旺达、坦桑尼亚、布基纳法索等国的选举均比较顺利,未发生大的波折。

撒哈拉以南非洲政局仍将保持总体稳定

引发中东国家动荡的原因非常复杂,是内外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就内部因素而言,既有社会、经济层面的问题^②,也有政治层面的问题;但比较而言,主要不是经济方面的问题,而是与之相关联的政治问题。因为此次北非局势动荡,是在经济形势总体向好的背景下发生的;事实上,近5年来,北非的经济增长率在所有年份均高于全球经济增幅。在这方面,不能过于教条;这就如同在冷战终结之际勃兴的非洲政治民主化浪潮,外因会在某一时点上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一样。政治问题既涉及政治发展,包括政治体制、权力配置、政党制度、选举制度等宏观层面的问题;同时也包含政治治理,特别是良政建设、用人制度、收入分配、就业政策等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微观层面的问题。限于篇幅,笔者主要就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与北非国家在政治发展方面的情况做一比较。

(一) 政治变革比北非国家进行的更为彻底

北非国家政局之所以发生如此剧烈的动荡,就政治层面的因素而言,主要在于其政治民主化进程被人为地遏制。了解非洲政治发展的人都知道,冷战终结之际在非洲大陆勃兴的政治民主化浪潮发端于北非的阿尔及利亚。但鉴于主张建立伊斯兰国家和社会制度的“伊斯兰拯救阵线”在地方和全国立法选举中接连获胜;为了避免国家政权落入伊斯兰激进势力之手,同时也出于对世俗国家性质改变的担心,一贯标榜“主权在民”的西方国家基于国家利益和西方整体利益的考虑,做出了“维持现状”的选择。也正是在西方的默许下,阿军方强力介入,方阻止“伊阵”通过民选途径掌控国家政权。由于有了阿尔及利亚的先例,包括北非在内的整个中东国家的政治改革进行得都不是很彻底,可以说是“无果而终”。这就为日后埋下了隐患,此次北非国家普遍发生政局动荡,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在弥补“政治欠账”。

反观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虽然其社会经济水平在整体上落后于北非;但就政治发展而言可谓超前的,至少在政治改革方面比北非国家进行的更为彻底。尽管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在经历了政治变革最初几年的阵痛,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政局动荡、社会骚乱和经济衰退之后;随着民主政治制度性安排的建立,特别是随着具有“民族性”和“非洲性”的多党民主政体的建立和巩固,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政治形势从整体上说逐步趋于好转。政治民主化在政治体系,包

^① 关于非洲街道的政治功能以及非洲国家政治民主化进程的艰难性, See Jérôme Lafargue “La rue africaine en mouvement: politique et action collective”, *Politique Africaine*, N° 63, Octobre 1996, pp. 23 – 38. Also see Achille Mbembe, *Désordres, résistances et productivité*, *Politique Africaine*, N°42, Juin 1991, pp. 2 – 8; Gérard Prunier, “Violence et pouvoir en Afrique”, *Politique Africaine*, N° 42, Juin 1991, pp. 9 – 14; Jean – Pierre Chrétien “Les racines de la violence contemporaine en Afrique”, *Politique Africaine*, N°42, Juin 1991, pp. 15 – 17.

^② Leila Slimani “Les raisons de la colère”, *Jeune Afrique*, du 16 au 22 janvier 2011, pp. 20 – 21.

括政治体制、政权建设、政治运作、政党制度、选举制度、政治参与等方面带给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积极变化是显而易见的；并且从趋势上看，其“正效应”还将进一步显现。^①

（二）民主政治的制度性建设比北非国家更为完善

由于包括北非在内的中东国家政治变革不彻底，使得该地区目前依然是传统权威和现代权威最为集中的区域所在；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政治形式均缺乏现代国家的基本元素；突出表现在代议制度、政党制度和选举制度的“缺失”。诚然，虽然突尼斯、埃及等国也有议会、政党和选举，但在威权国家，这些制度形同虚设，难以发挥起码的监督和制衡作用；利比亚则禁止政党活动，其政治制度的设计本身就是为了排斥政治竞争和政治参与^②。其结果，在北非国家，除了执政党或统治集团之外，其他政治势力，如反对党或市民社会的力量都比较柔弱；这也是北非国家领导人在选举中能以高票当选的原因所在（如本·阿里在2004年和2009年两度连任总统，得票分别为94.48%和89.62%）。

相对而言，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在民主政治制度性建设方面的情况则要比北非好得多。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政治民主化使以多党制为特征的民主政体逐步取代一党制或军政权为特征的集权政体。经过近20年的磨合，目前，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民主政治的制度性建设已趋于定型，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积极的效应。例如，在国家政权系统的设置方面，本着分权与制衡原则，分别设置了民选的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和独立的司法机构；与此同时，建立了与国家政权活动相关的竞争性的政党制度和选举制度。在公民社会与国家政权之间，建立了反映和聚集公民利益要求的媒介体，诸如大众传播媒介系统、各种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利益集团等。因此，较之北非国家，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权力制衡机构，反对党和市民社会的力量，以及新闻媒体等舆论监督力度则要强大的多。

（三）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基础比北非国家更为广泛

北非国家的领导人长期执政，大权独揽，政权继承显现出世袭的倾向；并形成了一种事实上国家领导人终身任职的老人政治局面。^③在北非六国中，领导人平均执政时间在23年以上，平均年龄在69岁以上；而在此次政局发生大规模动荡的利比亚、埃及和突尼斯三国，其领导人平均执政时间超过31年，平均年龄超过75岁；如卡扎菲（69岁）当政42年，穆巴拉克（83岁）统治30年，二人均有意将权力传给其子；本·阿里（75岁）执政23年，还试图通过修改选举法，谋求长期执政。^④由于北非国家领导人的政治合法性主要来源于政权本身，因而比较容易引发权力继承危机或政治合法性危机。

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随着宪政意识的强化及政党政治和选举制度^⑤的确立，多数国家的政权更迭趋于制度化和常态化。民主化后，撒哈拉以南非洲政治发展中的一个积极变化就在于：在宪政的范围内，按照多数裁定原则，通过多党竞争和民选方式获得政权成为被普遍认可的政治规则。现阶段，多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宪法规定总统任期不得超过两届，从而在制度上为政党“轮流坐庄”提供了法律依据。目前几乎所有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都在民主政治框架内举行立法和总统选举；其中许多国家已经完成了第四轮，甚至第五轮换届选举。另则，借助民主政治的制度性安排，能够基本保障各政治主体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或利益诉求及民众的政治参与，并按照既定的政治规则展开有序的竞

① 张宏明《政治民主化后非洲内政外交的变化》，载《国际政治季刊》2006年第4期，第95～107页。

② 这部分内容综合、吸纳了下列学者的观点：王林聪2011年2月21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学部国际形势研讨会上的发言《中东时局的新变化及其特点》；岳西宽在2011年3月14日发表在《环球时报》上的文章《中东国家陷入重建困境》；殷罡在接受《第一时评》节目专访关于北非政局动荡原因的分析，see http://tv.mso.com.cn/html/yule69_xiaoyouxi/5023401.html。

③ 参见王林聪2011年2月21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学部国际形势研讨会上的发言《中东时局的新变化及其特点》。

④ 此前，突尼斯已就总统任期和年龄进行过两次修宪：2002年5月，突尼斯举行独立后首次全民公决，通过宪法修正案，取消对总统连任次数的限制，并将总统候选人的年龄上限增至75岁。2008年7月，再次修宪，放宽2009年总统参选条件。

⑤ 需要指出的是，非洲国家的民主政治、政党政治和选举制度并不完善，关于这方面的内容，See René Otayek, “Les élections en Afrique sont-elles un objet scientifique pertinent?” *Politique Africaine* N°69, mars 1998, pp. 3-11; Patrick Quantin, “Pour une analyse comparative des élections africaines”, *Politique Africaine* N°69, mars 1998, pp. 12-28.

争，从而扩大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基础，使民选政权的执政地位更加稳固（当然这些都是相对北非国家比较而言的）。

诚然，撒哈拉以南非洲一些国家也存在与北非相关国家相类似的现象，诸如一些国家的当权者已经或试图通过主导修宪，谋求长期执政，个别国家甚至还存在“老人政治”现象。但情况与北非国家又有所不同：一方面，这种制度性安排是在民主政治和宪制框架范围内施行的；另一方面，这只是一种个别现象，不像北非国家那样具普遍性。

（四）政治治理方面总体上强于北非国家

多党民主政体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普遍确立后，民主化进程逐步从制度层面推进到价值层面；民主、法制、人权观念已经潜移默化地渗透到多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在多党民主政体下，由于新闻自由得到法律的保障，舆论监督的力度不断强化，特别是鉴于政党兴替导致政权更迭频率加快的现实，促使非洲各国执政党及其领导人注重自身形象，以借重民意巩固执政地位或谋取连任。另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已成为衡量非洲国家民主政治成败的一项重要指标，为此，不仅非洲各国政府积极推动以民主、法治、效率为核心的“良政”建设^①；非洲联盟也创造性地提出和建立了“非洲互查机制”^②，用以核查和评估各成员国实行“良政”的效果。虽然“良政”建设、“互查机制”均覆盖整个非洲大陆，但较之北非国家，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在这方面更为积极。例如，布隆迪、坦桑尼亚等国在政府中专门设有良政部；目前在29个自愿加入互查机制的成员國中已经有13国完成了检查和评估，其中主要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

结 论

基于上述分析，特别是基于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与北非国家政治过程的比较研究，笔者认为，撒哈拉以南非洲不会在整体上复制北非乱局；在全球化和“新媒体”时代，北非势态的“蝴蝶效应”被人为地放大了。换言之，北非势态基本上是区域性的，局部性的；其辐射区域主要集中在中东阿拉伯国家；不大可能会穿越大沙漠，传导到撒哈拉以南非洲，进而引起整个大陆层级的动荡。事实上，自非洲国家独立以来，波及全非的政治动荡和社会骚乱只有一次，即冷战终结后在整个大陆层面勃兴的政治民主化浪潮。“总体稳定、局部动荡”依然是今后一个时期非洲政局走势之常态。

（责任编辑：詹世明 责任校对：樊小红）

① “良政”（英文：good governance；法文：bonne gouvernance）概念包含体制、政治和行政三部分内容，大致可以界定为“一种建立在自由民主模式基础上的，维护人权和公民权的，拥有行政效力及具有道德规范的、廉洁的、负责任的政治体制”。需要指出的是，“良政”概念并不是在20世纪80年代非洲实施“经济结构调整计划”之初提出的；而是在多数非洲国家步入政治民主化进程后的90年代提出的。A. Leftwich, *Governance,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in the Third World"*, *Third World Quarterly*, 1993, Vol. 14, No. 3, pp. 605, 619-620.

② 2002年11月，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举行的“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首脑会议决定建立“非洲互查机制”（The African Peer Review Mechanism）；2003年3月，“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首脑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了实行“非洲互查机制”的一系列文件；2004年2月，正式启动“互查机制”；目前，已有29个国家加入这一机制。

The Evolution of Class Structure in Egypt Since 1900s and Its Impact on Current Social Issues

Dai Xiaopi

pp. 25 – 32

Egyptian class structure has undergone tremendous changes in formation of following 4 distinct periods: 1805 to 1840, the first independent construction period (period of Muhammad Ali) , 1840 to 1952, the first external influence period (including Said and Ismail period and the colonial and semi – colonial period) , 1952 to 1970, the second independent construction period (Nasser period) , 1970 to 2011, the second external

influence period (Sadat – Hosni Mubarak period) . These changes of class structure affected social progres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restricted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and lead to long – term social unrest. The tremendous change of class structure in Egypt since the 19th century has made profound impact on the country ’ s political,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fields.

Viewpoints on the Tendency to Sub – Saharan Africa Political Situation

Zhang Hongming

pp. 33 – 41

The Turmoil taking place in North Africa has not only made a direct impact on the Arab world in the Middle East, but also posed a potential threat on sub – Saharan Africa. In terms of the future political trend in Africa: firstly, some countries in Sub – Saharan Africa, the political turmoil may be inevitable; but situation in Africa overall may keep stability. Secondly, even if unrest may occur in some countries of Sub – Saharan Africa, it will be

different from what happened in North African; the unrest here will not generate spillover effects like North Africa. The reasons are that, the ethnic structure, religious beliefs, cultural traditions, especially political reforms and political governance, etc. , these countries are different from what in the Middle East. Therefore, “the overall stability while local turbulence” can still be regarded the normal political situation in Africa.

On Hamas’ Suicide Attacks

Chen Tianshe

pp. 55 – 63

The main body of the Hamas’ suicide attackers was young men. There were various motivations for the suicide attacks. There were four social factors for Hamas’ suicide attacks. Firstly, the miserable experiences of Palestinian became a hotbed of the suicide attackers. Secondly, the strong identity of the Palestinian to suicide attacks provided deep public bases for Hamas’ suicide attacks. Thirdly, the Palestinian turned to violence as a resort of the despair of the Palestinian – Israeli peace process. Finally, the Hamas’ suicide attacks had a lot of religious fac-

tors. The Hamas’ suicide attack caused two effects. One is that it caused the Palestinian and Israeli to fall into a vicious circle of “violence to violence”, but it strengthened the Hamas’ leader position as a resistant organization. Another is that it caused the martyrdom culture to become popular in Palestine and inspired many Palestinians to join the suicide attacks. In conclusion, the roots of the suicide attacks of Hamas and other Palestinian groups are the Palestinian despaired of the status quo and the Palestine Question has not been revolved.